



剪不断 理还乱

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US-CHINA RELATIONS



邓鹏 李小兵 刘国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透 视 美 国

剪 不 断 理 还 乱

——美国外交与美中关系

邓 鹏 李小兵 刘国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剪不断，理还乱：美国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邓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

(透视美国书系/邓鹏主编)

ISBN 7-5004-2663-1

I. 剪… II. 邓… III. ①对外政策-研究-美国②中美关系-研究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5825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100720)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625 插页：2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2.00 元

《透视美国》编委会

主 编 邓 鹏

编 委 陈嘉放

李小兵

潘佐红

俞燕敏

陈 亮

林建忠

孙建荣

陈维刚

刘国力

鄢利群

F231.54 81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对美国的外交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揭示美国外交政策的文化根源、社会背景、产生机制和实施方式，旨在找出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本书作者指出，美国的霸权外交是美国民族独有的历史经验的产物和价值观念的延伸，也是美国经济的需要和美国国内民主政治的折射。正因为如此，美国既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又是对世界局势稳定的严重威胁。由于美中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差距，美中关系将长期存在各种障碍。同时，在建立一个繁荣、和平和公正的世界的事业里，两国之间又有许多共同利益。发展美中之间的建设性的双边关系有赖于坚持交往、扩大贸易、发展共识，而这需要两国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的勇气和不懈努力。

总 序

《透视美国》书系旨在对美国在 20 世纪，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潮流进行一番较为深透的剖析和解读。这套丛书的产生不仅因为美国文明本身对人文和社会科学有研究价值，而且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因为美中关系对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的重要性及两国关系里一再出现的困难：它不仅凝聚了我们的希望，而且包含了我们的关切和担忧。

美国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观。它继承了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和 19 世纪产业革命的巨大成果，借助于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全球性的移民潮流和历史给予的机遇，在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一跃而跻身于西方列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雄踞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霸主地位在东欧集团和前苏联解体后似乎得到进一步巩固。我们估计，在下个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内，美国将保持在很多领域里的领先地位，继续对世界局势产生影响。

美国文化深受犹太—基督教精神浸润，集文艺复兴、宗教

改革以来的西方文化之大成,又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共同智慧,不仅具有磅礴的气势、丰富多彩的内涵,而且具有强大的张力,可与古埃及、印度、巴比伦、古希腊、罗马以及汉、唐时代的中国媲美。美国文化的包容度本为美国民族的经历所决定,反过来这一文化又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可以说,美国文化不仅仅属于美国人民,它乃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这一文化本身及其影响值得中国的知识层研究。

虽然美国目前如日中天,不可一世,但其社会的内部却也在酝酿着一些深刻的危机。这些危机往往根源于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美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由于美国的国力和对当今世界的影响,由于美国文化的世界性和扩张性,这些危机不仅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现在和将来,而且对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譬如,美国倡导了遍及全球的汽车工业和与之相适应的汽车社会,而汽车在扩大人们的生活半径、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却对人类的生存提出了最严重的挑战。在可口可乐和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探讨它们所代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可能导致的后果。

中华文明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跟它的邻居的交往。中华民族不但自己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and 丰富的生活,而且善于向其他的民族学习以丰富和完善自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凝聚了我们祖先的智慧,“海汇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则是中华文化大度的写照。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许多介绍其他国家和文明的著作,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可能是对外交往的最早文字记载,以后的《史记》和《汉书》反映出中国人对中亚地区的兴趣和了解。唐代僧人玄奘根

据自己到印度取佛经的见闻写出的《大唐西域记》，“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为研究中国政府和人民跟中亚和南亚地区的人民的交往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一优秀的传统连绵不断，宋代周去非写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也是介绍外国的地理民情的佳作。

中美两国在近现代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两国文化差异悬殊，互相排斥，另一方面，两国又以各自的优点互相吸引。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两国关系时冷时热，恩怨难解。自19世纪40年代起，几代中国人漂洋过海、筚路蓝缕，对美国进行了反复的观察研究，并不断将自己的见闻认识诉诸文字。道光年间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记的《海外蕃夷录》是介绍美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的第一部书。以后，中美两国交往持续发展，截至1882年美国实行限制华工入境法为止，到美国打工、求学、经商、游历甚至从事外交的中国人与年俱增。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认识也日渐深入。一些具有学术水平的著作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其中包括志刚的《出使泰西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梁廷的《合省国说》和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它们不仅介绍了美国的社会民情和科学技术，而且对美国文明也进行了扬抑褒贬。一些中国人甚至将他们对美国的观感用英文写出在美国发表，其中曾经担任中国驻美国外交大臣的伍廷芳写的《一个东方外交家眼里的美国》^①最为透彻生动，该书在某

① 见 Wu Tingfang, *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Publishers, 1914)。伍廷芳同时还担任中国驻西班牙、秘鲁、墨西哥和古巴的外交大臣。

些方面甚至可以跟法国著名作家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媲美。

这种认识过程的艰辛今天不难想见，因为它不仅受到空间的阻隔，而且受到风云诡谲、变幻莫测的中美关系的制约。由于中国在近现代饱受西方列强的欺侮，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剧烈摇摆，有些中国人在研究美国时不免采取急功近利的态度，在介绍和评价美国时往往以偏概全，难以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评价美国，一些著作对美国一味褒奖推崇，另一些书籍则把美国说得一无是处。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更有不少学者囿于某些既定的理论框架，对美国进行类似缘木求鱼的探究。所幸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学术界拨乱反正，对美国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正确的政策造成学术上百花齐放的健康环境，经过成百上千的中国学人将近二十年的辛苦耕耘，美国研究终于在中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可喜局面。

国内目前有关美国的书籍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国人写的游记和关于美国社会的随笔，如最近出版的《第三只眼睛看美国》、《这就是美国》、《访美散记》和《告诉你一个真美国》。这类书的优点是考察面宽，观点独到，且文笔淋漓酣畅，精彩之处常常使人拍案叫绝；但是它们基于个人印象，属于复旦大学汪熙教授所说的“个案研究”^①，难免有挂一漏万、失之偏颇的时候。另一大类是有关美国的专著，大多出自中国学者之手，如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推出的

① 汪熙：《丛书主编前言》，见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这些书多为高屋建瓴的扛鼎之作，其作者有相当深厚的英文功底和理论造诣，他们那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更值得我们学习。与此同时，个别的研究由于作者缺乏对美国社会的长期感性体验，也存在一些使人感到不得要领的地方。

非常有趣的是，直到今天，美国对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阶层仍然是个难解的谜。中国人对美国的评价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美国社会的复杂、多极、活力及矛盾，美国文化的雄浑、活跃、躁动，各亚文化之间的反差，以及美国生活的喧嚣和纷然杂陈使我们困惑，也引起我们了解美国、剖析美国文明的不可扼阻的欲望。

我认为，中美关系不仅关系两国人民今天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下个世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在雅尔塔体系结束后，环太平洋地区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板块和文化组合。美国在今后的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将仍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对象。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国不仅将提供一些重要的技术和资金，而且是许多重要领域里的参照物。换言之，中国既可以向美国学到许多先进的东西，也可从美国的失败中吸取不少教训。明眼人都清楚，美国今天的文明有特殊的历史条件，美国的经验中国人不可能全盘照搬。但这种泛泛的真知灼见还需要通过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具体分析才能深化，也只有深化我们对美国的认识，才能对美国的经验进行正确的扬弃和吸收。

参与本书系写作的人员均为在美国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华裔学者，大多为旅美华人社会科学教授协会的成员，其专业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传

播学、教育学、宗教学、文学和美国学等。我们横跨中美两种文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越的视角，在各自的领域里又都有一定的建树。我们有志将自己对美国多年的观察、思考和研究成果总结出来，奉献给国内的读者，以自己的一得之见跟国内的同行和师友交流切磋。

同时，作为“文化中国”^①的一部分，我们也希望以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跟美国的“主流”社会进行有益的对话，以我们的思想和学术成果丰富美国、改善美国，尽管这种影响目前还十分微弱。我们相信这种对话将有助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有助于消弭由于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造成的隔阂甚至敌意，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作为经历了冷战阴霾的一代学人，我们深切地认识到，人类只有地球一个家园，各国人民虽然有各自的利益，但在生存这个根本问题上彼此休戚相关。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对世界和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我们乐于为两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尽绵薄之力。

任何学术著作，不管其作者的态度如何严肃，学养如何深厚，都有它的局限性，何况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常常被中国学人称为一个“谜”的国家，更何况学界的前辈和同行对美国的方方面面已经进行了反复深入的研究。长期旅美虽然给我们深入考察美国社会和文化以机会，但对这种机会的利用还受到我们的见识和研究能力的限制。再者，久居美国也可能使我们对一些情况司空见惯，反而丧失原先的敏锐，这就

① 哈佛大学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提出的概念，用以称呼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华文化圈。

是古人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我们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家之言，舛误之处一定不少，还请各方的专家、前辈和同行多多更正、指教。

这套丛书自始至终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立道先生的大力支持，宋先生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给我们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在编辑和出版过程中花费大量心血。特借《透视美国》书系跟读者见面之机，向他表示诚挚谢意。

邓 鹏

1999年5月20日

于美国北卡罗来那州绿堡亚当斯农场

前 言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转眼之间，人类来到了 21 世纪的门口。

世纪之交的世界瞬息万变，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微妙复杂。其中美国与中国的状况，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倍加引人注目。美国经过了两个世纪的稳步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第一号强国，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些革命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势必影响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为；中国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激荡之后，正在艰苦地探索和平稳定发展的道路；它近 20 年来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这样的进步必将进一步提高它的国际地位，扩大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外部世界、包括美国人在内对此怀着矛盾的心情。

孔子曾经说：“言忠信、行笃义，虽蛮貊之邦行矣。”这句话可以概括古代中国的外交思想。历史悠久的中国有优秀的外交传统；中国文化以人为本，中国人与人交往以和为贵，注重礼仪，以信义著称，常常想用自己的教化影响其他民族。古代中国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成为邻国学习的榜样。古代中国政府居高临下，对邻国采取“绥远方、柔远人”的

政策。中国政府和人民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又发展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技巧和手段，同时，跟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和互通有无也丰富了中华文明。直到近代，中国在世界东方保持文化上和国际关系方面的领袖地位，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19 世纪初至今的近两百年里，中国民族经历了中华文明有史以来的最严峻的挑战。工业化的西方通过武力，把一整套国际关系制度强加在中国人头上。中国人被迫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外交思想，适应现代的民族国家的关系法则。中国的现代外交随之出现，几代中国的外交代表、从满清时代的恭亲王、李鸿章、郭松焘，中华民国政府的顾维均、翁文灏到新中国的周恩来、陈毅，无一不是在跟西方国家周旋、抗争的过程中磨炼成长。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几代中国人为反对西方霸权、争取国家独立而不懈奋斗的结果。这种大国的地位来得非常不易。不仅让生活在大陆的 12 亿同胞扬眉吐气，也使生活在海外的数以百万计的炎黄子孙为之骄傲。

在中国的外交史上，美利坚合众国只是一个姗姗来迟的客人。美国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中国在美国的外交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中国以其众多的人口，始终是美国商人朝思暮想的广阔市场；旧中国在科学技术、工商业方面的落后以及中国在近现代的深刻变革，又为形形色色的美国人提供了活动舞台。尤其是 19 世纪末以来，随着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的增长，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和演变就是其突出的表现。虽然这一政策起初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但却反映了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形势的一厢情愿的态

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经过长期犹豫，最终站到抵抗侵略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边，在中美关系史上谱写了值得珍视的篇章。

美国从建国初期的一个“蕞尔小国”发展为今天的超级大国，除了自身的能力增长之外，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美国的利益以及公众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也随之变化，这种变化势必反映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美国人世界观跟他们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的变化是基本平行的。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它的文化大体是西方文明的延伸，它的外交传统跟中国迥然不同。一方面，美国文化深受基督教的浸润，有强烈的道德追求；另一方面，美国文化尚在襁褓中时，就显示出唯利是图的天性。从这种文化衍生出的实力外交思想和十字军情怀对中国人都是非常陌生的。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末，美国在东亚的政策的一贯的目标是开拓那里的市场，追求这一地区的国家的门户开放。与此同时，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外交与其自身在经济上的发展和地域上的扩张同步，形成以经济外交为主导以军事实力和文化传播为辅的东亚外交。这种外交的主要对象是中国，其次是日本和朝鲜。

如果说外交政策的基础是知己知彼的认识的话，那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朝野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是非常肤浅和幼稚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为数不多的外交官、商人、外交家和学者。这些人对中国的介绍和报道除了局限于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之外，还受到他们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以及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普通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几千年灿烂的文明，不了解中国在近现代所经

历的屈辱，更不理解中国人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愤恨。出于同样的无知，美国政府对华实行了一种自作多情的帝国主义政策：一方面，美国人视自己为中国的“朋友”，事实上的确也对中国提供了许多帮助，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一切行动又无一不是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这种骨子里的利己主义使美国在许多关键时候不惜损伤中国的利益。美国人自己对此却没有正确的认识，所以美国人和政府对华的态度呈现出剧烈的摇摆和波动。这种现象在美国人对华革命的反应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美国和苏联平分秋色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在 50 年代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里的重要成员。这种联盟由于美国政府的冷战策略，由于美国对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更由于朝鲜战争得到了强化。美国政府和民间对共产主义的扩张也感到极大的恐惧。从杜鲁门到肯尼迪的几届美国政府都对华层层设防，采取了所谓的“围堵”（遏制）政策。对华的围堵除了加强美国对日本和南朝鲜的完全承诺之外，美国还组织和利用东南亚条约组织来阻止中国可能的“南进”。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越南战争自然难以避免。

然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困境和中苏关系的恶化给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一个重新估计对方和自己的战略利益、并在新的认识上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的机会。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他们的政治家的远大眼光。中国政府摆脱了僵硬的意识形态的框架，美国政府也超越了对世界政治的简单的二极图解，两国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时期。这

种关系适应了 70 年代迅速改变的国际政治格局，初步确立了美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对当时苏联的咄咄逼人的霸权外交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为中国的内部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可惜中国当时正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白白错过了这一历史的契机。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风云变换，中美关系总体上日趋缓和，双方谅解加深。从 1972 年的《上海公报》到 1979 年正式建交，两国结束了长达 20 多年的敌对状态。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幸事，也是世界人民的幸事。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国际政治中克服了许多障碍，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合作持续发展。两国领导人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往来和接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与日俱增，两国学术界之间的交流成效显著，美国的中国研究在冷战期间由于像费正清这样的学者的奔走呼号已经形成气候，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在冻结之后也得到复苏，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学术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里成立了不少美国中心。冷战后的中国政府在对美国的外交方面也更加老练自如。

中美两国需要进一步的沟通了解，然而由于中美两国文化上的悬殊，两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所以尽管双方不乏良好的愿望，尽管两国的眼光远大的领袖人物和外交家为促进两国关系进行了不断的努力，尽管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从来没有完全中断，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自始至终时冷时热，在 20 世纪的浩劫成为历史，冷战的阴云已经消散的时候，中美关系却反而面临倒退的危险。90 年代发生的若干不愉快事件至少说明中美两国文化之间的鸿沟之宽，两个民族之间的互相谅解之困难。